

◎中国封底丛书

君难手

中国古代知识分子及其阴性书写

赵晓辉 著

特邀顾问指导：孔庆东 朱大可 朱建军 李国文

江晓原 苏三 吴言生

王权下的依附心态，阴性文化史。



敦煌文艺出版社



◎中国封底丛书

君难托

中国古代知识分子及其阴性书写

赵晓辉 著



 敦煌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君难托：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阴性书写 / 赵晓辉著.
兰州：敦煌文艺出版社，2008.1
(中国封底丛书)
ISBN 978-7-80587-880-5

I. 君… II. 赵… III. 知识分子 - 研究 - 中国 - 古代
IV. D691.7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202946 号

君难托——中国古代知识分子及其阴性书写

- 作 者 赵晓辉 著
责任编辑 赵金祥 jin669@sina.com
装帧设计 奇文云海
出版发行 敦煌文艺出版社 (730030 兰州市南滨河东路 520 号)
印 刷 兰州万易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889 毫米×1194 毫米 1/32
印 张 5.75 插 页 1
字 数 120 千
版 次 2009 年 12 月第 1 版 2009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1 000
书 号 ISBN 978-7-80587-880-5
定 价 15.00 元
-

(敦煌文艺版图书若有破损、缺页,可随时与本社联系更换。)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阴性书写：质疑与构想

“阴/阳”这对语码，无疑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最重要的范畴之一，它凝结了国人的智慧，并在不断被阐释的过程中，蕴涵了颇为丰富的象喻潜能。本书并不采用所谓“女性书写”的说法而代之以“阴性书写”，正是为了避免陷入性别的二元对立的叙述圈套中。一些作品虽为女性所作，但不能保证其书写内容呈现阴性势态。事实上，很多女性作者在写作中自觉或不自觉地戴上了性别的面具，而采用一种主流的、阳性的、正统的口吻来说。而在传统文学或文化流衍的过程中，许多男性作者却因身世际遇之坎坷等原因，其情志处于屈抑状态，观其文章，其为言也哀以思，其感人也深以婉。这种凄凉怨艾，杳眇婉转的情致，便呈现一种明显的“阴性特质”。综观中国古典诗词，由男性作者使用女性形象与女性语言来创作的现象颇为普遍，本书大量援引唐宋词来说明这一现象。若就美学的观点言之，很多唐宋小词确乎体现了一种“双性人格”的特质。当然，古之作者未必有意追求这种特质。这些男性的作者，竟然在剪红裁翠、无边风

月的游戏之作中,无意间展示了一种深隐于心灵深处的女性化情思。与其他言志载道的诗文大为不同的是,这种表达更为细微幽约,更显阴性势态。最为常见的就是,在这些小词当中,这些文人士大夫书写了一个又一个处在寂寞孤独中若有所失的、对爱情满怀期待却又慵倦被弃的女性。因为长久地染指这种纤柔的女性特质的文体,文人写作时也会不自觉地将自己女性化起来。其实人的内心世界莫不兼具阴阳两种势态,当我们缅怀往事,对景难排,感到时光流逝,惆怅不已之时,我们已然体会到了阴性的情怀。事实上,通过这些阴性文本的解读,我们往往能更加深细地进入这些作者的情感世界,更好地了解他们内心的隐秘。

阴与阳的关系是辩证的,二者之间可以相互转化。对于写作的人来说,不断地吸纳对方性别的优秀潜质来让自己的写作超越其所在性别的局限,这似乎已经成为现今文学艺术领域内更为普遍的现象。另外,虽然本书从西方的一些理论中借用了一些概念和方法来解读中国古典诗词,但就其根本来说,“阴性”这个概念是深深根植于中国古典文化的,任何理论和名词,它只能成为照亮古典诗意的一束光亮,并最终会随着诗意的呈现而销声匿迹。

二

中国古典文化,就其思维方式和内在特质来说,乃是一种偏于阴性的文化。若以诗歌为主要考察对象,会发现其“阴性特质”甚为明显。从屈宋骚赋、乐府古诗、南朝新声至唐诗宋词,或

有一二阳刚豪放之语出于其间,但其始终没有成为文学发展的主流特质,而且文人似乎有意抑制这种阳性特质,并认为这并非诗歌的正体,这从宋人对待词这种文学体式的态度上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一点。到了清代,人们普遍赞誉精致纤柔之美,阴性文化繁盛已极,最后我们看到了一个民族的衰亡和古典时代的终结。正是基于中国历史上阴盛的事实以及文士们普遍被屈抑的阴性心态,使得中国古典诗歌富有阴柔、幽约、潮湿、绵邈、弱化等阴性之美。

另外,中国社会自秦帝国建立以后,一直处于高度集权的君主专制的政治模式中,“三纲五常”是其伦理观念的集中体现。所谓“仁、义、礼、智、信”,乃是一种人格德行的神话,因为完美得不可企及而构成了对真实人性的挤压和戕害,好比历史上对于女性“贞节”的苛酷要求,最终却成了杀人利器。所谓“三纲”,即“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在这种人际伦理关系中,为君、为父与为夫者,永远是高高在上的掌权发令的主人,为臣、为子与为妻者,则永远处于被控制、支配的对象。在这样的伦理秩序当中,君王秉承天命,统御寰宇,高高在上,不容置疑,“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诗经·小雅·北山》)。对臣而言,君永远是一种主动的、具有绝对权威的阳性的存在,而文士则永远是屈抑的、被动的阴性存在。就现实的生存需要而言,文士以其长期涵养而成的知识、道德进入仕途并谋求与其德行相匹配的生存资料,成了他们所期许的实现自身价值的唯一正途。俗语云:“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一个“货”字,道尽了这种主奴化的君臣关系。在“三纲”中,“父”与“子”属于一种先天的伦理关系,这种基于血缘关系建立起来的

亲子关系是较为牢固的。事实情况是,父亲很少抛弃儿子,而儿子在叛逆家庭之后,最终会忏悔并回到年迈的父亲那里,从此,他们的情感更加深厚。而“君臣”和“夫妻”则是一种后天的伦理关系,为臣或为妻,其得幸或见弃都被操纵于君夫手中。他们有着更为广泛的选择余地,永远不愁是否会有更新更美的“货”送上门来,而被逐之臣与被弃之妻,却全然没有自我保护和辩解之余地,因为这并非真实的货物,可以有退换的情况发生。那些开始被起用而最终被疏远、放逐的臣子,有的隐逸山水,有的遁迹园林,有的皈依宗教,有的则在愤懑屈抑的阴性心态中了此残生。这种伦理的残忍之处在于,无论被逐还是见弃之后,仍然要求他们保持身心的忠贞不贰。于是这些失宠被弃的人,永远怀着矢志、被弃的痛苦,在悲伤的命运之风里徘徊,找不到依托,并写下幽约怨悱的诗篇。

西方的女性主义文论,曾将社会政治地位以性别化的方式区分,以为男性化是属于统治者的层面与地位,而女性化则是属于附属者的层面与地位,认为女性本是一种弱者,是被压抑与被屈辱的。然而阴阳的划分比起男/女的性别划分更加圆融,其内涵也更为广阔。所谓“阴性特质”,不独属于女性,在中国漫长的古典文化传统中,女性作为写作者古已有之,但承载这种“阴性特质”的文本,恰恰并非主要由女性所建构和完成,反而由大多数男性文士在阳性的言志载道的政论文章之余写出。故所谓“阴性书写”,并不强调书写者的性别,它是由男性或女性来书写的一种偏于阴性的创作态势。

本书试图就“中国古代文人的阴性书写”这一命题加以探讨,而全然无意于成为一个阴性文学与文化的描述文本。本书

的写作力图揭示诗歌中那些令人迷惑的阴阳转换和阴性美感，这些章节不按普通的逻辑和类别加以阐述，它并非为所谓文学研究的苑囿添枝加叶。自然，若单论所谓“阴性书写”，似乎有违古人“阴阳对立”、“孤阴不生”之理。然而古典文学的“阴性特质”，乃是一种与诗性之美有天然熨帖关系，并在客观上给人以纯粹诗性体验的范畴。为叙述方便，本文选取了香草美人、伤春悲秋、托志帷房等若干个极具阴性表征的诗歌母题来加以探讨。这其中包含了深入诗歌内部细节的大胆想象和实验性尝试，尤深入而专注地讨论了这些诗歌母题的阴性意象、叙述者的口吻、情思及角色的转换等问题，同时“阴阳变奏”被专门辟成一章来加以讨论。有时，我们需要以既古老又新鲜的方式来看待古典诗词，在这些诗歌面前，你不妨想象自己就是一个在诗歌的筋骨肌理间玩耍的儿童，所有芜杂的术语和严肃的诗歌理论都将随着诗意的显现而终结使命，而深入其中的读者，最终将获得一种有趣的阅读体验。

目 录

上编 阴性的诗歌表征

第一章 香草美人 / 001

第一节 祭献之物:阴性香草 / 002

第二节 美人:阴阳的双重意象 / 007

第二章 伤春悲秋 / 013

第一节 负阴心态:悲秋 / 015

第二节 另一种负阴心态:伤春 / 022

第三章 相思怨别 / 031

第一节 相思:明月与寂寥 / 033

第二节 别离:流水及其他 / 041

第四章 深情苦恨 / 051

第一节 阴性群像 / 052

第二节 异性情结 / 064

**下编 阴阳变奏——兼论男性书写中的
女性形象及口吻**

第一章 阴性意识内置的中国古代文士 / 077

第一节 托志帷房 / 079

第二节 弱化男性 / 093

第三节 性别换装 / 105

第二章 被书写的女性——她的形象与口吻 / 117

第一节 自然女性:终结与溃败 / 119

第二节 情欲:窥视与代言 / 128

第三节 纯洁:毁灭与救赎 / 139

第四节 祸水:诋毁、杀戮与幽禁 / 146

后记 / 167

参考书目举要 / 170

第一章 香草美人

“香草美人”是中国古典诗歌里流传久远且影响绵长的诗歌意象,它源自屈原的《离骚》。《离骚》全篇 372 句 2490 余字,是中国古代诗歌史上最长的一篇,其结构之繁复、主题之丰富、情感之深沉,令人叹为观止。君/臣,神灵/香草,美人/诗人等,这些概念之间构成了一种富有诗性魅力的对应关系,仿佛可以一齐唱响,并且此呼彼应。直至今日,我们都在感慨这篇作品在繁复的对应和象征方面表现出来的创造力,它以“香草美人”的系统性隐喻、象征构成了典型的中国文人阴性心态的诗歌文本。

第一节 祭献之物: 阴性香草

屈原曾在《离骚》中大量铺陈了很多香草的名字。由于远离自然,在我们对很多植物的名字都表现出一种无知和陌生的今天,想要设身处地地理解这个时乖运舛的诗人与那些散发着媚人香味的植物之间的关系,显非易事。

在《离骚》中我们注意到,屈原对于这些香草的热爱,已经

到了十分痴迷的境地。在某种程度上说,这些灵异的花草已经成为与他的生命息息相关的一种象征。这些植物的香气,已经渗透到了他日常活动的每个方面:

他将香草作为佩饰:“扈江离与辟芷兮,纫秋兰以为佩。”

他采摘香草:“朝搴阼之木兰兮,夕揽洲之宿莽。”

他认真而大量地种植这些香草:“余既滋兰之九畹兮,又树蕙之百亩。畦留夷与揭车兮,杂杜衡与芳芷。”

他竟然有些疯狂地饮掉香草的露水并且吃掉它们落下的花瓣:“朝饮木兰之坠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

他在香草丛生的地方徜徉、休憩:“步余马于兰皋兮,驰椒丘且焉止息。”他穿着香草的衣裳:“制芰荷以为衣兮,集芙蓉以为裳。”

他深深地恐惧它们行将凋零:“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迟暮。”

诗人如此痴迷和热爱香草,以至于这些行为在我们今天看来有些疯狂和不可思议。然而屈原笔下的“香草”具有一种人格道德方面的暗示和象征,透过这些馥郁的芳草我们看到了一个品德高洁、既有“内美”又重“修能”的诗人形象,它是贤人君子的人格象征。这些植物散发出沁人心脾的芳香,就好比君子馨香的德行,文人为香草的繁茂而欣



屈子行吟图

喜,为它寂寞的萎落而伤怀,它们的身影在中国古典诗词中散发出恒久的芳香。

这种对于香草以及一切芳香事物的特殊迷恋以及将它们作为与文士道德相对应的客观对应物的思维方式,在古典诗词中成为一个源远流长的传统,甚至在文学表达的传统里已经具备范式意义。中国传统文人的思维,感性而诗意,他们很少对于道德有着明确而逻辑森严的界说,而擅长于在自然的观察中找到与自身道德同构的事物属性。他们努力地学习和赞美自然的事物,看见一棵高大的树木,他会感到喜悦,写下《庭中有奇树》这样的诗篇。冬天的松柏凌寒而不凋谢,孔子赞美它们“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论语·子罕》),以此来比拟君子坚贞不屈的人格力量。屈原还歌颂过橘树,橘树“受命不迁,生南国兮”(《九章·橘颂》),其忠贞不贰也值得诗人长久地学习。美好的事物必然与高尚的道德相匹配,从这点意义上说,一定程度的以貌取物是十分必要的。在自然中徜徉,无论你的性格多么特异与孤傲,必有一款植物适合你。周敦颐在其著名的《爱莲说》中云:“予独爱莲之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中通外直,不蔓不枝,香远益清,亭亭净植,可远观而不可亵玩焉。”如果如波德莱尔所说,整个世界都是一座象征的森林/花园,那么在这座园林中间,富有意味的或可爱的花朵/象征物随处可见。陶渊明在清高的菊花身上找到了自己的影子,他笔下的菊花和南山一样著名:“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饮酒》其二)这种花朵,散发出稀疏幽寒、若有若无的香味,和选择了隐居生活、性格内倾的陶渊明心有戚戚,所谓“花之隐逸者也”。牡丹花,它看上去富丽堂皇而雍容华贵,被喜欢热闹和梦想富贵的大众所喜闻乐

见,所谓“花之富贵者也”。而莲花,作者喜欢它的理由显然与其道德含义相关——出淤泥而不染之高洁,濯清涟而不妖之清新,甚至它还与人的尊严相关:“可远观而不可亵玩焉。”

这些芬芳可爱的植物,无论花朵还是香草,在中国古典的诗人那里,作为心诚志洁的象征,它们被用来祭献给神灵、爱人或者君王:

采芳洲兮杜若,将以遗兮下女。(《九歌·湘君》)

折疏麻兮瑶华,将以遗兮离居。(《九歌·大司命》)

被石兰兮带杜蘅,折芳馨兮遗所思。(《九歌·山鬼》)

无论是高高在上的神灵、被追慕的美人还是寄托了诗人政治理想的君王,有时他们具备双重身份,既是恋人又同为神灵,同样都处在主动的位置上,作



山鬼

为一种阳性的、富有力量与权势的姿态存在,对忠于神灵、恋人或君王的人具有生杀予夺的权利。甚至在祭献——这种富有仪式感的行中,为了取悦于那些神灵,祭献者自己也将自己的身体弄得香气四溢,甘愿像那些美妙的植物被祭献出去:

浴兰汤兮沐芳，华采衣兮若英。（《九歌·云中君》）

灵偃蹇兮姱服，芳菲菲兮满堂。（《九歌·东皇太一》）

香草和诗人本身构成了一种复杂的对应关系：当香草存在于自然当中，诗人狂热地喜爱它，栽培它，并把它作为自己高洁品德的对应物。当香草被祭献出去，诗人自己也力图将自己变成芳香四溢的香草。

因为对这些香草媚人的香气以及自身香草般芳洁的靈魂有着深刻的体认，抑或更为深刻的自恋，所以对于贤人君子来说，试图将它们献祭给神灵和君王的行为也就在所难免。在被献祭的过程中，这些人必然身负不能自主的阴性心态，因为全部的命运已经掌握在君王或神灵手上。一个女人刻意散发出芳香的气味，必定会招引异性的注意。然而在时运不济的诗人那里，一切的努力似乎是徒劳。在诸多失意文化的景观中，我们通常看到，祭奠者虔诚地献上悦目的香草和如香草一般芳洁的美质，然而最终却并没有等到神祇的降临或帝王的恩宠。那些匆忙、高傲，态度变幻莫测的神灵，他们只是匆匆来到人间，灵光乍现之后，就永远地去了。人神道殊，只留下这些怨艾的人群，永远地滞留人间。他们大多数只能怀着被疏远和被遗弃的恐惧，在痛苦和焦灼的等待中让生命白白虚耗。时光飞快流逝，“日月忽其不淹兮，春与秋其代序”，令人惶恐的秋天到来了，这些苦心经营的香草就要全部萎败，它们不再能维持芳香的气味和美好的姿态，诗人为此而感到哀伤，我们在《离骚》中反复听见一种怨艾的声音：

虽萎绝其亦何伤兮，哀众芳之芜秽。

恐鸱鸒之先鸣兮，使夫百草为之不芳。

时缤纷其变易兮，又何可以淹留！兰芷变而不芳兮，荃蕙化而为茅。何昔日之芳草兮，今直为此萧艾也？

这些本来可以倚恃的香草一旦失去了芳香的气味，就变得和一般恶草毫无二致。对于一个对诗人香草般芳洁的美质毫无感知的君王，自然这种奉香草以为祭献的仪式，连同“好修以为常”的美质已经毫无用处，它像一支箭被矢志不移地射出去，但却碰到了不可预知的挫败性力量，最后它锋芒的锐利被完全废掉，只能以死亡告终。

第二节 美人：阴阳的双重意象

当然，在以上被服香草并以之沐浴，使整个躯体变得馨香的过程中，我们还可以联想到那些正在妆容的美人。由此而引发出了另一个意象：美人。

“美人”在先秦时代，并非仅指美丽的女性，它还指那些富有德行的贤人君子。一方面，就实在的意思来说，诗人自认为具有“美人”的贤德和优雅外表，他自己就是“美人”。当灾难的命运像夜晚的星辰一样来临，它在某种程度上加速了诗人性别角色的转换，诗人以贤人君子自居的“美人”身份也必然具有一种